



国外经济学名著译丛

● [美] W.W. 罗斯托 著 ● 郭鼎保 王松茂 译

经济增长的阶段

非共产党宣言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 W.W. ROSTOW

图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经济学名著译丛

● [美] W.W. 罗斯托 著 ● 郭熙保 王松茂 译

经济增长的阶段

非共产党宣言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W.W. ROSTOW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美)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2

(国外经济学名著译丛)

书名原文: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ISBN 7-5004-2935-5

I. 经… II. ①罗… ②郭… ③王… III. 发展经济学—研究
IV. F0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8417 号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朝辉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三版说明

在《经济增长的阶段》第一次出版 30 年之后，第三版作为一部经典著作再次出版了。在一篇新的序言和附录中，罗斯托教授把他的分析扩展到世界舞台上最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由非线性和混沌现象所提供的理论观点。对于那些初次阅读该书的读者，我们这一版包括了第一版的正文、导论和附录。在正文中，罗斯托教授用特定社会的历史作为说明，对建立在由技术变化流引起的动态生产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他区分了五个增长阶段，并对每个阶段提供了详细的讨论。他还把增长阶段概念运用于军事侵略、核武器竞赛以及冷战的结束的考察。他早在 1960 年就预见到了冷战将会结束。最后一章包括了他的非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第二版的材料包括在附录中，在那里，他对主要批评者作了回答。

第一版序言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和长期努力的产物。

说得近一点，本书是根据 1958 年秋季我在剑桥大学讲学时准备和发表的一系列的讲演写出来的。在麻省理工学院七年一度的休假期间，我应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邀请，向本科学生讲了我对“工业化过程”这一主题的看法。本书就是由于接受这一邀请而作的努力的直接产物。它仍然保持着当时不拘形式和非专业性质的特点。

另一方面，本书实现了——至少是暂时实现了——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我在耶鲁大学读书时所立下的决心。当时我决定专门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范围比较小的问题，即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经济史；另一个是范围比较大的问题，即在整个社会各种活动中，把经济力量与社会和政治力量联系起来。从那时起，作为一个学生和教师，我一直在从事这两个问题的研究。

特别是，我发现马克思对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以及其他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在当时并没有打算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来替代它。在以后的年代里，在我研究 19 世纪的英国时，当我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讲授美国史时，在我研究现代俄

国、中国和美国时，在我阐述对经济增长过程的一般看法时，我探讨了这种关系的各个方面。此外，有时对军事和外交政策问题的研究经历也增加了我的一些启发。本书综合了到目前为止我从上述各方面得到的关于这个中心问题的认识。

本书所提出的观点可以在更常规的论著中，以更大的篇幅、更详细地和更专门地加以阐述。但是，以简单扼要的方法，对有见解的非专业读者阐明新思想可能有某些好处。一个教授大学本科生的教师应该尽量避免使用那些晦涩难懂且令人转移注意力的阐述方法。无论如何，我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前来听我讲演的那些朝气蓬勃和提出疑难问题的学生，他们的反应使我的讲演具有一种学术探险的真正气氛。

xlvi

第四章实际上是根据我在 1956 年 3 月号《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从起飞进入自我维持的增长》一文的重印。我对其做了一些删改，承该刊编辑慨允，收入本书。

我还要对剑桥大学和其他大学曾对本书的一套观点发表评论的那些人表示感谢，我尤其要感谢以下各位：劳伦斯·巴斯、肯尼思·贝里尔、丹尼斯·布罗根、理查德·古德温、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特、理查德·康恩、艾伯特·克温、W.J. 麦克弗森、冈纳·缪尔达尔、M.M. 波斯坦、E.A. 雷迪斯、C. 拉菲尔、丹尼斯·罗伯逊爵士、琼·罗宾逊、乔治·罗森、C.P.N. 罗森斯坦—罗丹、阿瑟·施莱辛格、查尔斯·威尔逊以及《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人员，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无论是否完全接受，都证明是极有帮助的。

我对我的妻子埃尔斯佩斯·戴维斯·罗斯托表示深深的谢意。当我在 1957 年夏季研究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时，她坚持认为必须运用研究经济史所能提供的各种见解。直接根据她的主张和嗣后进行的长期对话，增长阶段的全部次序才第一次排定，并且在本书第七章至第九章中用增长阶段来说明当前的一些问题。

我要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们表达我更持久的和更普遍的谢意，他们对我所提出的论点的各个方面不吝发表意见；我尤其要感谢 1950 年以来研究生讨论班上的学生选修我的经济史课程，他们积极地参加了我的思想结构的建立工作。

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马歇尔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我许多便利，使这本书的准备工作能够轻松愉快地进行。他们在百忙中愿意协助一位临时教师，令我永志不忘。

第六章说明私人汽车普及情况的图形和附录中提供的补充资料是出自约翰·郎敦的劳动，他非常慷慨地放下他自己的工作来帮助我，用很生动的方法说明了我在这方面的论点。

最后，我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允许我休假一年的那些人和卡内基公司，该公司为我这一年的研究提供了自由和资助。在目前的学术生活中，要找到一种环境，使人能完全集中注意力于一种思想的思考，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罗斯托

1959 年 3 月

于剑桥，马歇尔图书馆

第二版序言

一

在《经济增长的阶段》出版 10 年后考虑第二版时，我在思忖着修改原文的问题。有两个原因使我决定把本书的变化限制在前言和附录 B “批评与证据” 上。

第一是理论的分析骨架问题。

由于附录 B 中提出的原因，我不想改变对经济增长的基本观点；而且我把过去 10 年中有关过去和当代世界的累积证据看做从整体上说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增长阶段的概念。这 10 年是经济史研究和当代世界增长研究极富有成果的 10 年。暂时我不想争辩说，如果重写的话，本书将与第一版完全一模一样。有些重要的数据和分析，我当然要认真考虑。但是，我的结论是，通过一个附录而不是重写本书的内容是最好的做法。

《经济增长的阶段》是一个描绘一个大问题的努力，它不是经济史百科全书。在本书中，引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可得的新数据将会改变它的特点和目的。

虽然关于增长阶段的某些争论进行得很热烈，但是，争论的

核心只是关于看法的技术分歧：增长是按照总量概念（如 GNP、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例、GNP 中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的份额等）来分析？还是这些总量必须与部门和分支部门（在这些部门内，新技术实际上被有效地吸收到整个经济中）的变化联系起来？如果采纳前一个看法，那么，起飞时间和相继的阶段似乎是模糊不清和印象不深的。如果接受后一个看法，并且准备挖掘资料，那么，从过去历史中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增长的阶段就会清晰地呈现出来。（在 1970 年 3 月的《经济史杂志》上，我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作为经济史的过去 25 年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任务》。在该文中，我用增长阶段方法分析 1945 年以来地区和国家的演进。）

西蒙·库兹涅茨教授率先在总量分解的适当程度问题上对增长阶段发动了抨击。而且，他作为增长的统计分析家的非凡学术成就很适当地影响了其他学者。但是，在我这部分研究中，我是他早期婚姻的孩子。这就是他的《生产与价格的长期运动》（1930 年）。该书比任何一本其他著作，促使我开始对增长分析长期采取那种方法。这种分析是与一个历史学家本能采用的基本上是部门与分支部门的分析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它分析过去的事情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

库兹涅茨的《长期运动》有一段（见该书第 3—4、5 页和第 10 页）表明了它与增长阶段分析的联系：

经济发展的这种图景当我们首先以较宽的范围然后以较窄的范围考察时，遭受奇怪的变化。如果我们考虑 18 世纪末以来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受干扰和似乎持续不断的增长。我们观察到，原材料的开采和制成品的质量和数量方面的生产和贸易不停地扩张，呈现出不变的指数增长。

但是，如果我们选一些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工业部门，那么，图景就变得不那么一致了。有些国家在某个时间领先世界，而另一些国家在另外的时间领先世界。有些工业在世纪初发展最为迅速，有些在世纪末发展最迅速。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单个国家或单个工业部门之内，不存在一致的、不受阻碍的增长。英国在世界经济中丧失了领先地位，因为它自身的增长，曾经在1780—1850年间很快，但之后放慢了。它已被发展更迅速的德国和美国超过了。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曾经有惊人增长的纺织业首先让位于生铁，然后是钢，而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电子工业取得了领先地位。

如果我们按国家来区分不同的产业，这个观点就进一步变得不同了。英国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比美国要早得多，比利时的煤炭产量在20世纪初就几乎达到了稳定的水平，而与此同时，美国和德国煤炭生产仍然显示出强劲的增长。无论与一国整个工业相比，还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同样的工业相比，一国范围内的单个工业部门发展常常出现停滞…… xli

当我们观察在一个既定的国民体系中的各个工业时，我们看到发展的领先地位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工业并不是无限地继续它的强劲的增长，而是在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放慢它的速度，然后被后来发展迅速的工业部门超过。在任何国家中，我们都观察到不同的产业部门活动相继领导着发展过程，在每个成熟工业中，我们发现增长率显著放慢。例如，在美国，1880—1890年铜矿开采的蓬勃发展并没有持续地强劲下去，1870—1900年以后钢的生产，1830—1880年以后铁路建筑都没有保持持续强劲的增长。

在许多工业中，在某个时期，基本技术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这种根本性变革发生时，一个新时代就开始

了。在制造业部门，这个时期就是机器加工首先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手工劳动的时期。在采掘业，这个时期或者是发现了一种商品的来源和用途（如石油）的时期，或者是找到迄今为止尚未利用的商品的新的和广泛的应用。作为这样时期的具体例子，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如 18 世纪 80 年代英国的棉纺工业和生铁生产，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钢的生产，19 世纪 80 年代的制铜工业，19 世纪 30 年代的无烟煤生产和 19 世纪 40 年代烟煤生产，19 世纪头 20 年炼锌（比利时），19 世纪 60 年代的石油和 19 世纪 70 年代的铅（美国）。在所有这些事例中，我们观察到有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过程，于是，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法。我们这一代是汽车和无线电工业这种变化的见证人。

但是，这些强有力的见解（与新技术的采用和国家的生产道路联系起来）并没有被库兹涅茨和他的追随者所遵循。由于凯恩斯革命，国民收入和投资数据的国际基础的产生以及国际社会选择组织产出数据的方法（也许受到科林·克拉克开创性努力的影响），统计学家已面临一个诱惑和困境。诱惑是专注于和利用这些容易获得的、能够组织的为国际比较之用的数据资料。困境是这些数据使统计学家不容易在国际基础上理解部门和分支部门。而正是这些部门实际上出现新技术，并产生扩散效应；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意，现代增长源于新技术在有效的基础上的不断扩散。这个分析任务在国家基础上一般是很有可能的，特别是如果分析家准备使用不完备的时间系列和非统计数据。但是，人们在非总量水平上不容易产生统计基础，允许进行准确的国际横向比较，特别对历史的过去进行比较时。

我并不对别人关于他的研究优先和策略提出问题；我们大家都是库兹涅茨收集的关于增长的总量数据的忠实消费者。但是，

我感到遗憾的是，库兹涅茨早期的观点不见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沃尔萨·霍夫曼和阿瑟·F. 伯恩斯有时也持有这种观点。）如附录 B 试图阐明的那样，我认为，从历史和当代研究中，从统计和非统计分析中，这些观点开始重新出现了。霍利斯·B. 钱纳里和兰斯·泰勒的《发展模式：横向与长期比较》（《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68 年 11 月，第 405—412 页）就出现了关键部门系列分析。由于在对增长的统计和国家分析中，把总量与部门分析联系起来的过程正在进行中，我认为，我们在这个中心论点正在接近。所以，附录 B 不是一个辩论的文献，而是一个寻找共同的基础和缩小而不是扩大观点分歧的努力。

但是，我要重申我以前所说的话：没有适当的总量分解，对增长的研究就是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或带着手套弹钢琴。我们当然需要大量的总量数据，我们大家都深深地感谢克拉克、库兹涅茨、钱纳里和其他人，正是他们按照这些总量对各种模式进行了分析。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对当代穷国和富国的增长研究的学者，我确信，在以一个有序的方式把这些总量与部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正是在这些部门中，存在着技术与生产的关键联系，使现代增长分析，用沃伦·韦弗的话说，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复杂性”领域。

回顾起来，我认为这个论点本应该在《经济增长的阶段》第一版中更突出地提出来。因为要与一本小书相称，我对这个问题的说明只是局限在第二章末尾题为“动态的生产理论”中的大约 4 页篇幅。我做一个脚注，请参考我关于部门分析在增长研究的作用的早期著作《经济增长过程》（牛津，1953 年和 1960 年），这里所做的说明是建立在这本书的基础上的，还可参考《经济进步》（道格拉斯·哈根编，卢万，1955 年）第 15 章“资源配置在长期增长中的趋势”。显然，这不足以使这个问题得到清晰的说明，但是，我不能肯定，如果智力兴趣和抵制成了问题，缺乏尖

锐的、长期的争论的任何东西将会有助于观点的阐明。

抵制阶段分析的一个原因是，它实际上否定了统计分析家把人均 GNP 用作为增长的衡量尺度。如果把技术有效吸收的程度作为增长的衡量尺度（应该如此），那么，就可能有相对富裕和相对贫困的国家处于同一个增长阶段，这要取决于人口—资源比例、出口能力、旅游和外援等。例如，阿根廷在起飞时比印度要富得多；加拿大比俄罗斯富得多。此外，因为大众高消费取决于人均收入和收入需求弹性，人们能够让国家在充分地 and 有效地吸收那些与技术成熟相适应的技术之前，就进入那个阶段，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而且可能还有科威特。

xliv 如果人均 GNP（或类似的收入尺度）能够用来定义增长阶段，那对我们大家来说，研究就容易得多。而且，如附录 B 指出的那样，各社会中大致上的平均模式与这种尺度是吻合的。但是，如果不揭开平均数的面纱和到达技术被特殊部门有效地吸收的程度，那么，我们就是在使用一个笨拙的工具，而且有时可能出现令人误解的结论。

无论如何，我在过去10年中关于增长所学到的一切使我确信，《增长论》中所包含的对增长的基本部门的、总量分解的分析方法是正确的。关于《阶段论》的大量争论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和其他争论的问题一起，我们将在本书附录中讨论。

二

第二个因素导致我把对《阶段论》的修改局限于序言和附录。本书既是一个科学的努力，也是时代的产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写作时，我把本书所包括的工具与当时使我们大家关心的很多特殊问题联系起来：

美国和其他可以预见的富裕国家在超过大众高消费时代以后的问题和可能性是什么？

苏联^①的增长前景和美苏相对增长率的意思是什么？

在这个权力扩散的世界上，从冷战走向稳定和平的前景如何？

世界南方发展中地区的前景是什么？它们是怎样与和平的前景联系起来的？在发达的北方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它们？

在评价本书讨论这些问题的部分是否应该修改时，我提出了两个问题：回头看时，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是错误的吗？在过去10年中，这些问题的形式和内容是怎样发生变化的？

除了提出人们、社会和政府当转到探索新的前沿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推测大众高消费以后的生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第11—12页，第90—92页，第156页）。除了提出问题之外，关于这一点上的争论的基本贡献是这样一个断言：汽车—耐用消费品—郊区化的部门系列在20世纪50年代已丧失了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能力。10年后，我认为这个论点是相当清楚的。（附带指出，在那里有几段强调美国战后出生率上升，这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出生率到20世纪60年代的下降而被证明是错误的。） xlv

至于苏联的增长率，部门分析（第102—103页）证明是有帮助的，而且谨防线性预测的警告也是适当的。同预测的那样——这个预测在当时是有争议的——苏联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持续下降。苏联是否、如何和以什么速度前进到汽车—耐用消费品系列，已成为莫斯科政策的中心问题，以在苏联建造菲亚特汽车厂的决策为标志。

预测权力从华盛顿和莫斯科向外扩散在20世纪60年代的确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果（和中苏分裂的加剧）成为历史

① 本书指前苏联。——编注

的分水岭。美国和苏联采取行动通过非扩散协定来限制这种扩散范围；不过反过来，这个协定也对两个核大国施加了某些约束：如果核武器扩散被局限于目前十分危险的限制，那么，它必须得到实行。

在某些方面，权力的扩散推动着莫斯科和华盛顿走平行路线（如 1965 年的印巴战争），鼓励美苏关系实行有限的正常化。但是，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危险的相互对抗仍然存在。20 世纪 60 年代还没有看到冷战的结束，虽然很清楚经历了一个脱离斯大林时代的简单模式的转变过程。

最后，世界政界对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对世界南部地区发展的挑战的确作出了很大的反响，促使印巴联合，成立进步联盟，出现了“发展的十年”的一般概念。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都没有达到自我维持的增长，甚或进入起飞。但是，在每个发展中地区，进步足以证明，如果出生率能够降低和得到较发达国家持续的充分支持，促进发展中国家进步的工作是可以做到的。在每个地区，都有一些迅速的、经常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事例，这些进步是在忠于民族文化，在政治独立的环境下取得的，并与国家确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相吻合。但是，正如皮尔逊报告（《发展的伙伴》，1969 年）和其他研究所指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20 世纪 70 年代的发展议程仍然是巨大的。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我对它们进一步分析的贡献包含在另一本书《政治与增长阶段》中。

在 1959 年初快要完成《经济增长的阶段》时，我决定详细地阐述它的政治方面。我长期对政治学 and 经济学相互交织感兴趣，但是，我在本书中自觉地限制了对政治的论述。像我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我把本书看做“不仅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而且是整个现代史的更一般的理论（尽管它还是非常局部的）”。由于《政治与增长阶段》的出版，我已经努力扩大我能够对整个

现代史提供的观点。

那么，由于这些原因，第 6—10 章仍然保持原样，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将得在别的地方看我对这几章主题所作的评论。

W.W. 罗斯托

1970 年 6 月

奥斯汀，得克萨斯

第三版序言

—

本书在 1960 年首次出版时引发了一场相当大的争论，这场 ix
争论在其后的 10 年里仍在继续。在那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是一名公仆，不能回应别人的观点。因此，第二版（1971 年）序言和附录 B 讨论了《经济增长的阶段》引发的论战。虽然论战已经平息，但是两个相关的理论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需要何种增长理论？大规模创新的现实具有不可逆转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结构性结果，它们如何影响这一问题的答案呢？因此，本版扩充了附录 B 以便从更宽的视野中反思这场论战，包括非线性动力学的出现以及过去 10 年将该方法应用于经济现象的努力所提供的观点。

本书还包括了第一版序言。它简要回忆了 1958 年对剑桥学生所作的讲座，那次讲座是本书的来源，该书也记录了对同事的持久感谢。除了下表（序言第 18 页）进行了更新并作了轻微的调整外，本书保留了 1960 年首次出版时的原样。

本书第三版的主要理论基础存在于《阶段论》对当今、未来